

## 人文大師下午茶·王德威院士談 「思想的文學、行動的文學」

- 時間：107年5月19日(六)14:00-16:30  
地點：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中央展廳  
主講人：王德威(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講座教授、中央研究院院士)  
主持人：鄭毓瑜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)  
與談人：李筱涵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)  
吳佳鴻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)  
張斯翔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)  
楊宗翰(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  
詹閔旭(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)  
趙家琦(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  
賴佩暄(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)  
陳碩文(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  
鍾秩維(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)  
羅景文(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  
記錄：李忠達(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)



圖一：人文大師下午茶·王德威院士談「思想的文學、行動的文學」

文學有什麼必要性？王德威院士在本次人文大師下午茶以四位與臺灣皆有淵源的作家：王小波、郭松棻、陳映真、陳冠中和他們的作品為例，對目前關心的社會現象產生聯想，說明知識分子如何介入文學的操作，至社會議題的關懷。而什麼樣的文學能發揮思想的能量，並參與運動，因而「思想的文學，行動的文學」為本次講座主題。

## 一、理論的出發點

王德威院士首先介紹四位歐洲思想家的看法，作為反省文學意義的理論背景。1947年，沙特（Jean-Paul Sartre, 1905-1980）寫下《什麼是文學》（*What is Literature?*）一書，反省歐洲在戰後的精神廢墟上，需要什麼樣的文學來振衰起敝？他反對風花雪月、無病呻吟，強調溝通和思想的傳達。文學必須盡力投入，不是針對少數讀者、閉門造車的工作，而敘事則是這世代最需要的文類。

其次，薩伊德（Edward Wadie Said, 1935-2003）《知識分子論》（*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: The 1993 Reith Lectures*）對知識分子的經典定義是：「知識分子是一個流放者，局外人，業餘者，也是一位面向權威、運用語言說出真話的作者。而他說出真話的方法是爬梳另類資源，打撈湮沒的文件，復原被遺忘或被拋棄的歷史。」

洪席耶（Jacques Rancière, 1940-）則認為，政治是發掘被壓抑的、被邊緣化的人、事和思想，重新把它們帶入公共的對話領域。文學是政治的一種方法，



圖二：王德威院士引用漢娜·阿倫特《人間境況》書中主張，闡述語言、思想、行動的意義

它讓各種事物匯聚，相互競爭，也就是「感性的配置」。作者經過文學想像來實驗各種配置的方式，利用文字讓各種感性的元素得到解放。

最後，漢娜·阿倫特（Hannah Arendt, 1906-1975）《人間境況》（*The Human Condition*）一書主張人類創造自己存在的意義。人必須對工作付出關懷和興趣，創造前所未見的可能性，這便是行動（action）。人的意義在行動中展現，語言則用以串聯行動。言說對自我、對周遭的人、對歷史的流變負責，這接近於中國傳統中的「立言」，而立言的方法則是說故事，是敘事、是文學。

總結這四位思想家的看法，知識分子用語言說真話，反省現實，化為行動。文學在此格外重要，尤其是虛構的文學，因為它是發揮創造力、參與現實的重要形式。

## 二、《黃金時代》：一本書寫文革的奇書

王小波是當代大陸自由主義的代言人，也是從文學跨到思想和公民行動的典範人物。王小波在美國留學，受到許倬雲影響念歷史，但他真正的志向在思想和行動的可能。1989年，他受到天安門事件刺激，認為在學院教書無用，開始以創作立言。在大陸那嚴密監管的社會中，他是體制外的作家，文字更充滿叛逆性。

《黃金時代》描述文革時期一個農場中發生的事情。農場有一位寡婦，丈夫剛死，突然眾人指控她不貞潔，不斷逼迫她坦白曾跟哪些男人發生關係。在極度壓抑的時代，這是場大型的審判，也是一場嘉年華會。寡婦屈服於壓力，而且加油添醋的說故事，來滿足控訴者的露骨慾望。「黃金時代」激烈的反諷出教條主義的宣言底下，無非是赤裸裸的色情，這是白晝宣淫的時代。王小波用最色情的語言，講述每個人不能真正隱藏起來的慾望。這是政治的慾望，意識型態的慾望，是對文革最嚴厲的控訴。

他還寫道：我最羨慕的是下放農場裡的一隻豬，牠特立獨行，知道自己被殺的命運，但牠永遠不合作。我已經四十歲了，除了這隻豬，還沒見過誰敢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，我倒見過很多想設置別人生活，或被設置生活卻甘之若素的人。

他提示出廣義的文學負擔著政治上的壓力。就像聶元梓寫的〈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〉，這也是一種文學、一種行動，但是它對社會帶來多大的破壞？她的案例讓人反思，什麼時代讓所有人剝去禮義廉恥的外衣，成為時代的犧牲者？

### 三、為革命而獻身

陳映真為革命而獻身，王德威院士用他的案例來討論獻身所付出的負面代價。陳映真的《山路》講述 30-40 年代臺灣年輕人獻身於革命的事蹟。女主角回首當年為革命獻身，不禁想到，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，她愛慕的對象赴死、未婚夫的終身監禁，是否是比死、比半生囚禁更殘酷的徒然？對於在反共寶島上獻身革命的人來說，文革象徵著多大的背棄和失望？儘管大陸已經改革開放，向資本主義靠攏，陳映真仍堅定的選擇左派立場。到底他是落伍者，還是孤單的獨行俠？他的功過尚未論定，然而他的文學更值得臺灣人閱讀。

另外，郭松棻原本只是普通的留學生，但是 1970 保釣運動爆發後，他義無反顧的成為全職運動家。就像魯迅 20 年代說的，在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，文學沒有它的位置。1974 年周恩來邀請保釣人士到中國，他們震驚的發現，那是極度壓抑、不自由、落後的社會，和他們夢想中的烏托邦差距太大。但郭松棻選擇繼續攻讀左翼思想，開始批判沙特。他回到了文學，在文學創造的時空中，寄託自己的憧憬，解決歷史的僵局。

文字是郭松棻最後 20 年延續他對革命最激烈情懷的紙上形式，文學要求獻身，這是一份有殺氣的文學宣言。因此王德威院士認為，郭松棻的字字句句都是文學的另外一種呈現。

### 四、一部中華民國的烏有史

陳冠中的作品極具實驗意味。他曾積極的辯證左派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能發揮什麼功能？他不認同中國政權，但是定居在政權最核心的北京。他的作品深藏著對思想、對政治的批判。

《建豐二年》寫的是一部烏有史。建豐指蔣經國，他把中華民國史寫成《三國志》一樣改朝換代的王朝歷史。他問：如果國共內戰是國民黨勝利，那麼從那時到 2010 年的歷史會如何發展？結果白色恐怖、西藏抗暴、嚴厲的思想審查仍然會發生。當北平的民運分子在美麗島食堂中聚會，建豐無奈地長嘆一口氣，宣布將異議分子全部都逮捕。一切思想的箝制，專制的統治仍然沒有任何改變。陳冠中注定左右都不討好，他絕不會廣受歡迎，但他釋放我們對歷史的想像力，讓我們理解在各種歷史的夾縫裡，許多不可思議的人和事產生奇妙的結局。因此我們對政治史必須有深刻的了解，才能體會它的趣味。

## 五、文學是什麼？

文學不只是小說、詩歌、戲曲，「文」是痕跡、印記、裝飾、文藝、知識、氣質、文化、文明。正因如此，知識分子藉著文學反映他們的感時憂國、抒發個人的情懷。小說對梁啟超來說是群治的關鍵，對劉鶚來說是「棋局已殘，吾人將老，欲不哭泣也得乎？」的感懷。文學革命的代言者魯迅，卻在啟蒙的時代中寫到「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，自在暗中，看一切暗。」文學不再是去照明，去指引方向，而是展現無比的洞察力，看到地獄可怕，人間比地獄更可怕。這是魯迅式的文學觀。

## 六、提問與回應摘要

提問：「思想的文學、行動的文學」特徵是什麼？是知識分子有家國意識、社會道德嗎？

文學就是一種思想的方式。不斷學習，與時俱變。行動不是立竿見影的動作，而是寫作、言說參與社會時，一舉一動對自己負責、對周遭的人負責，每次的思想和行動都是一種創新。在變動時代裡有行動的急迫性，人因靜不下來好好寫作，這種張力是我們反省的起點。然而文學未必帶來行動，但現在的所思所想會在另一個時空點帶來啟發和啟示。



圖三：現場提問與回應

提問：研究現當代文學能否成為一種志業？當文學被批評是脫離生活時，當學者在學院裡苟延殘喘時，研究者在鑽研小說之外，又要如何行動、如何參與？這和研究者個人的生命境遇如何聯繫起來？

先找到職業才能談志業。現在太多年輕人才沒有研究的機會，焦慮不安。如果說中文系是苟延殘喘，外文系恐怕就是灰飛煙滅了。這也是我不斷困惑的原因。花心血作文學研究，不見得有突破。在座沒有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熱情，既然沒有這種能力，很難想像我們會去靜坐抗議或者組織運動。但是我們做出新的課題，可以無愧於學術上的專業。一名學生對某個話題的好奇，也可能打破老師的舊看法，此時行動已經發生了。作為研究者，我先問自己能不能做好自己的專業。比如 1980 年代，很多人研究大陸新時期的小說、後設小說，晚清小說則是冷門，但晚清在史學上有很多發現，文學研究不該缺席，而且要引起思辨。晚清小說難看的很多，讀多之後就了解到，研究者不是在找最高標準的傑作，反而最壞的作品會給我們很多啟發和反省材料。我寫《被壓抑的現代性》在大陸受到嚴厲批評，罪名是反黨、反毛、反馬克思、反魯迅，能有的帽子都有了。因此學問不見得是靜態的、閉門苦思的，很多火花會在研究中迸發出來。

提問：為什麼是文學？思想、行動和革命的能量，為什麼只有文學能夠承載？其他媒材不能嗎？如何說服來自不同領域的學生？

為什麼不是文學？我有勇氣地說，我要用非常強勢的態度來捍衛文學。我



圖四：王德威院士（前排左二）、鄭毓瑜教授（前排左三）與年輕學人合影

認為文學的影響非常大，當然在研究上我們要對文學做精準的定義，我所謂的文學，廣義的包括電視、影音、書面或有聲光色的，只不過我選擇了相對古典、保守的文字。不只是臺灣，美國學生對人文的興趣也在逐漸衰退。我們有興趣的問題，學生不見得喜歡。我願意盡力教書，跟研究生溝通，有些學生從一無所知，經過一學期後對很多問題產生興趣。作為一名老師，教課對我很重要，認真學習也會得到知識。當然老師是有底線的，我會毫無退卻的說，這是我所選擇的工作。

提問：鴛鴦蝴蝶派和通俗文學的研究，學術界還沒有夠分量的論述。請教王院士對年輕學者有什麼建議？其次，教學上除了用清楚脈絡講授經典作品的方式之外，如何呈現演講、作家回憶各種文類的多元材料，讓學生明白？

簡單說，鴛鴦蝴蝶派促進了今天我們所謂的行動。哈佛大學編的現代中國文學史，討論五四運動之後，首先對五四的意義做出迴響的是鴛鴦蝴蝶派。文學史上談魯迅、陳獨秀的貢獻，都是後見之明。這些進步的、民主的文人代表當時龐大的書寫和應對模式，呼應我們今天說的「感性的配置」，但這是一個錯誤的示範，就像網路文學的數量是個不可測的黑洞，但它是氾濫、良莠不齊的寫作方式，數量和人文品質極不對等。鴛鴦蝴蝶派的研究困難，牽涉的是文學的閱讀和判斷、循環生長周期的問題。我們接觸的文學受到各種文化、政治的、資源的篩選。沈從文說過，漢魏六朝以來大量的文字失去和消滅，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過去如此，今天亦如此。學院的訓練之外，這樣一個文學的黑洞更令我們驚訝。

提問：人文學科的焦慮是「文學無用」的概念很難扭轉，離開同溫層，如何說文學中有思想、有行動、可以介入政治社會？人文的危機是全球性的，請教王院士的看法？

柏拉圖的理想國中，第一個被整肅的是詩人。從來沒有什麼時候是好時候，「危機時刻」也不只是現當代的危機。過往的教育總是從光明面、真善美切入，儒家傳統不斷強調人被教化的可能性，但這兩者間的張力一直都在。如果朱天文的作品能蠱惑人投身文學，此時對文學所投資的、犧牲的已經存在。我所講的不是文學的美好面，而是危險面，有如嘗試下賭注，有贏有輸，但都是在這個過程裡去從事相當重要的行業。

提問：對沙特來說，散文是介入現實的文類，寫作介入的對象即社會，此時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存在。人在差異中共同生活需要對話，而對話需要語言。文化研究是臺灣文學介入政治、性別論述、社會批判的理論基礎。當代的情境已經不是郭松棻、陳映真式的大革命，只是一種「小革命」，那麼此時的文學要為誰而寫？

沙特、郭松棻的時代過去了，現代是郭敬明所說的「小時代」；革命的時代也過去了，現代是文字氾濫、言說和行動不連接的時代。駱以軍的《匡超人》寫到，他的雞雞下面有一個洞，讓他想到人生的大問題、量子力學、宇宙大爆炸的黑洞，這竟然是他最大的人生問題，但你無法想像魯迅、茅盾會這樣寫作。當代大陸的作品也有同樣的傾向。所謂的行動不是拋頭顱灑熱血，但應積極去思考，找尋這個世代的共同話題更為實在。一百年的革命世代給我們的教訓是，行動不一定保證它的 authenticity，思想可能錯誤。我們有其他選擇，但我們沒有這麼做，因為我們受到文學的蠱惑，做了很大的冒險。

提問：行動如何用在宗教活動、戲劇演員表演、藝術表演？張承志的《心靈史》如何評價？

大家問的行動，不論是宗教進香、舞臺表演或其他，仍然停留在 work，是一個日常動態的活動而已。我所謂的行動是利用行為或其他方式啟動、發動，說明思想者關心的面向。行動不一定有立竿見影的效果，但在文學生產過程中，有一股動力讓你衝出去發聲，這是行動的開始。思想的文學、行動的文學是行動的開端，它帶來的改變或許是正面的，或許是負面的。張承志寫伊斯蘭教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，是行動的一部分。在臺灣，甚至選舉活動各種言詞和影音效果激發社會感性互動的過程，也是行動的一部分。行動帶來思維的翻轉，建立社會的轉折，這是我們曾經有過的理想與憧憬。大陸幾十年來的行動，反而有歷盡滄桑的感覺。所以行動有重新想像、創造的必要性。在小時代，我們的行動未必帶來改變，唯其如此，我們繼續想像文學帶來的刺激，我們看到的是黑暗和危機感。從事我們認為值得付出心力的文學研究，我們已經在行動當中。